

河北当代作家小说丛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李
祝
尧

村
夫
情



031787

河北当代作家小说丛书

村夫情

李祝尧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人是有情之物，爱是人之天性。苏洛泉及三个儿子对事业的追求和爱情的纠葛，是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大潮的缩影。长子苏业成为承包公社农场，冷落了美貌的妻子，使之投入一个光棍儿的怀抱；次子苏业旺的处世哲学是“人生在世，玩乐二字”，他进城赚了几个钱，便抛弃家中贤惠的妻子，追逐一个个轻浮的女人；三子苏业兴埋头事业，多经磨难，但终于获得纯真的爱情。《村夫情》以多彩多姿的笔墨，细腻传神的描绘，激动人心的情节，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展现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当代农村生活画卷。

此书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结构严密紧凑，语言明快流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很强的可读性。

村 夫 情

李祝尧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1.375印张 24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5.00元

ISBN7-80505-528-9/I·489

作者小传

李祝尧，男，1939年6月生于河北省冀县。共产党员，大专毕业。1958年参加工作。当过中学教师，历任县文联干事、宣传部干事、科长、副部长等职，现任中共衡水市委研究室主任兼衡水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发表论文、调查报告和通讯报道千余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40多篇。1980年5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追求》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论》等著作。《村夫情》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做伟大时代的“追随者”

——《村夫情》代序

● 周申明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飞旋的时代，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当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走出噩梦，踏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便注定了我们时代生活的风貌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雄浑壮美和多姿多彩。它的每一次脉动，都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它的每一个瞬间，都孕育着深刻的历史嬗变；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演示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交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各种思想意识相互撞击，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希望与失望，奋进与沉沦，慷慨悲歌与营营苟苟，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缤纷世界。因此，我们的时代，又必然是一个造就作家和诗

人的时代。正象英国诗人雪莱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诗辩》）

这场深刻而壮美的历史变革是从农村发轫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个“大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广大农村的面貌往往决定着整个国家的面貌，广大农民的命运也往往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命运。无论是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概莫能外。因此，作为伟大时代的追随者，我们的作家要“了解社会生活的每一次脉动的十分深刻的意义”，（皮萨列夫语）洞察时代生活的基本趋势，并进而作出艺术的概括和升华，就不能不对农村和农民投入极大的关注。进入新时期以来，许多有志于描绘我们时代生活画卷的作家，在农村题材这块希望的田野上执著地开垦和跋涉，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但是，对于这个不断运动着增生着的富矿来讲，已往的开掘其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不断地进行新的勘察，新的开掘，新的审视，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正因为如此，当祝尧同志把他的《村夫情》交给我以后，我以浓厚的兴趣进行了认真阅读。这部作品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农村改革伊始那些并不遥远的岁月。

鲁迅先生曾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热风·随感录：六十一》）已经越过了十余春秋的这场历史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进中的自我完善，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民族永不自满

的精神和品德的结果。有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象鲜花憧憬着甘美的果实，

象煤核怀抱着燃烧的意愿：

我心中孕育着一个“可怕”的思想

对现状我要大声地喊叫出：

——“我不满意”。

这首发表于1979年5月《诗刊》上的题为《不满》的诗，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对于改革的有力呼唤。它表达了亿万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心声：“不满正是对改革的希冀／不满乃是那创造的发端。”这就是改革初期时代精神的主潮。

有趣的是，《村夫情》也是从记录农民群众由不满而求新变的心声开始，逐步展开对于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生活画卷的描绘的。

作品中的濠阳店村在“农业学大寨”的岁月曾经走在生活的前头，得到过不少奖状和锦旗。如今，这荣誉却象沉重的包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当周围的村庄已经在热火朝天地闹“承包”的时候，这里却依然滞留于昔日的“荣誉”而按兵不动。这时，党支部书记苏洛泉的三儿子苏业兴在村里贴出了一张意见书，“将”了他老子一军，才终于打破了冷清沉闷的气氛。这张意见书表面上是冲着“爹”来的，实际上却不啻为对根深蒂固的因循意识的大发难，是新的开拓和创造的总宣言。应当说，这样的情节安排是颇有意味的。

就这样，这个位于濠阳河畔的小村庄的变革生活戏剧性

地开始了。作者把它置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展开了逐步深入的挖掘，并力求通过这个“点”的展示，来捕捉整个时代生活的雄壮节律，来表现芸芸村夫们的真挚情怀和他们撼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任何一项伟大的社会变革，都必须植根于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深刻解放，都必然首先表现为新与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剧烈撞击与交锋。《村夫情》所截取的生活处于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交汇部和转折点，因此，它在表现当代村夫的生活与命运的时候，也必须紧密注视这些人们的心理发展轨迹。

应当说，祝尧同志较为清醒地把握了这一点。

苏洛泉——濠阳店村党支部书记，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源于自身矛盾的自我审视、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精神历程。这位几十年来村里的带头人，已经习惯了“上工敲钟、掌灯开会”的整齐划一的工作方法，对于实行责任制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他们走的是一条逐渐集体化的道路，他想不通，现在为什么又要回头搞“单干”？是啊，多少年来，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苏洛泉被不断的热情裹挟着，来不及思索就走过来了。他不明白，这次为什么落伍了，跟党的号召“顶了牛”。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这场改革，不明瞭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其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法则，因而担心和困惑是难免的。

不过，苏洛泉这样的老党员，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事物

的真诚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他对责任制一时想不通，但“决不当前进的绊脚石”，因此主动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作品写道：“他卸了任，并没歇心，日日夜夜仍牵挂着村里的事”，该分的分了，该统的却统不起来，“村里停着的几眼井和几处扬水站开不起来，让社员们像合作化以前那样种地，这几十年的革命不白干了！”他觉得这事该管。特别是村办集体企业钢丝绳厂，这是他顶着挨批挨斗的压力，为村里偷偷培养起来的一棵摇钱树，怎么能总是停着呢？他不顾老伴和孩子们的反对，硬是把它承包了下来。就是这样，在生活实践中他渐渐认识到了改革开放方针的正确。他服从真理。

到这时，苏洛泉应该说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没有被时代生活甩掉而落伍。但如果仅仅这样，也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苏洛泉了，不是一个为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几十年来在风里雨里奔波的村党支部书记苏洛泉了。承包钢丝绳厂后，他亲自抓管理，跑业务，年底净赚15万多元。按合同规定这钱是他自己的，但他不要，也不留给孩子们。他说：“给他们留钱，不如给他们留德行。”于是，他把这些钱全都用在了发展公益事业，用在了社员们身上。

这就是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这也是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之中，竭力表现和张扬的一种精神。

这部长篇除了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苏洛泉这样一个给人启示、引人深思的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外，还塑造了一些代表着我们事业的希望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苏洛泉的长子苏业成、三子苏业兴等，这些新人形象带有鲜明的改革开放年代的时代特征。当然，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写到了改革

生活中另一类型的人物，象苏洛泉的二儿子苏业旺，依靠非法经营轻而易举地先富了起来，但他们终究是要受到生活的惩罚的。别林斯基曾说：文学创作独创性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在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这应当说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因为典型是一个指向性很清楚很严格的概念，真正能够称得上艺术典型的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形象中为数极少。但是，既要使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又要使他始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和活生生的人，这应当是每个作家都致力追求的目标。从《村夫情》中的众多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出，祝尧同志在创作中正是这样去做了，而且达到了较好的水平。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不仅注意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且在苏洛泉同周围人物身份编织起一个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的情感交汇，恩怨并织的人物关系的生活图景，着意挖掘人物性格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这种把新时期巨大社会变革背景下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通过一个家庭或几对人物种种关系的变化加以表现的方式，除了体现出作者在作品构思时艺术追求上的一个想法外，也更有利于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这样一种衡量标准，实际上包含了对于创作主体和作品效果两方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十分重视把握

时代的和民族的情绪与追求，做时代的歌手和时代历史前进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同时，这种主观愿望又必须付诸艺术实践，通过对时代生活的深入开掘和理想的方式，使之得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孙犁同志等一些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作家已经在他们的艺术活动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改革是我们当代生活的主潮，集中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追求，也最容易体现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风貌，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我们作家的热情关注。读了祝尧同志的这部作品并结合平时的思考，我以为，要使改革题材特别是农村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不断深化，需要时时把握这样几个环节：一是不断加深对改革生活的正确理解。只有树立正确的改革意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统一起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才能深刻理解纷纭复杂的改革时代的生活现象。二是密切注意现实生活的发展脉搏，不回避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矛盾与冲突，并力争从历史纵深与横向联系中去深加开掘，从而使作品获得特定的时代特征、深广的历史内容和独创性的艺术构思。三是要以人为中心，把人物塑造，特别是当代英雄形象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摆在重要的地位，努力刻画好他们的丰满性格和高尚情操，藉此使作品获得长久的艺术魅力。近年来不少描写改革生活的作品，虽然情节紧张，冲突尖锐，故事脉络清楚，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哲理性，但终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甚至如过眼烟云，迅即淡忘，其致命弱点就在于没有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没有写出现实改革生活中的“这一个”（黑格尔语）来。因此，这一点尤其应当引起足

够的重视。

愿我们时代的车轮转得更加迅猛，更为壮观。

愿祝尧同志和着时代的足音，不断写出新作佳作。

1991年夏·石家庄

这个县。“前丘自县全前不降，前村集虽留，前寨国移交”

第一章 行大匠路，风来雨降迎迎象，风来雨降迎迎象

。和同国第工匠路出然出，林来大工国全工匠路，代内缺

装大，的，旋旋而藏而道亦落坐，林和国第个音和同国第

密水县全，两章出南，儿林小前寨人自建十二百一个县，不

全前展然国第个音里村，到立匠交，既里来十只制县到非，一

联音，书条的理想天新迎友寄靠，对武武正三制前手一，业

少不拉排，“前黄”县，“要降”土崇智，县平，前“寨太学业求”

在，前寨前寨，前寨少不拉六十五由，前寨在，前寨前寨

一寨联个而，寨光前寨方之有来带前寨于前寨个寨前寨去甚

天降火然五林固固，来夫前不降前前前，前寨前寨前个个

不降前寨前个寨，县来代，前寨，前寨，“于国大，前寨

1

滏阳河曲曲弯弯，从西南向东北穿过冀中平原，在天津汇入海河，流入渤海。

滏阳河两岸属于黑龙港流域，好发大水碱地多，种地难拿苗儿，不收庄稼收碱巴，一年四季白花花。这一带多数村是“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常年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里人穷。“穷则思变”。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千军万马奋战十个冬春，修了滏阳新河和滏东排河。穷棒子们的战天斗地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近二十来年没发过大水，没涝过庄稼，然而人们依然是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穷则思变的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敢于思索，敢于闯新路了。在全国最穷的地方，首先实行了变革，他们打破了二十多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死框框，分田到户，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简称“大包干”——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个办法有神奇的威力，象股强劲的东风，刮到大江南北，刮到长城内外，刮遍了全国广大农村，当然也刮到了滏阳河畔。

滏阳河畔有个滏阳店村，坐落在滏阳新河巍巍的大堤下。这个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儿，南边靠河，全是水浇地；北距县城只十来里远，交通方便；村里有个打钢丝绳的企业，一年能赚三五万元钱。靠着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那“农业学大寨”的年月，曾经上“纲要”，过“黄河”，得过不少奖状和锦旗，在报纸、电台上有过不少报道。这些荣誉，在过去曾给这个村的干部们带来许多欢乐和光荣；而今却象一个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周围村正热火朝天地闹“大包干”，分地、分牲口、分农具，这个村却按兵不动，整个村子却死气沉沉。

尽管初冬的晨雾是那么浓重，但终究挡不住迟来的阳光。天刚破亮，起早到井台上担水的人们，发现大队部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意见书》，上面写着一首不太规矩的顺口溜：

全国形势大发展，
社社队队实行大包干，
社员都拥护，
个个齐称赞，
解放生产力，
生产搞得欢。
咱村为啥还不动，
这是为哪般？
莫非为谋私，

莫非为揽权？
莫非怕干活，
不能再轻闲？
奉劝支书苏洛泉，
去掉私心和杂念，
带领群众快前进，
赶快实行大包干。
这个意见谁同意，
请把名来签。

《意见书》的下端写着苏业兴的名字。

苏业兴是支书苏洛泉的三儿子，长得虽然聪明伶俐，却不善于说说道道，是个内秀人物。他在高中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就是一考就晕场，两次高考都落榜了。他干脆不再考了，想在城里找个临时工干，出去走自己的路。他跟爹有些不同政见，但没有在公开场合争执过，今天却用《意见书》的形式“将”了爹一军，顿时引来了不少人。人们念着，笑着，纷纷议论：

“这《意见书》贴得不错。”

“咱们支书是该将一军了！”

“你说咱村为啥摠着不分田哩？”

“这不都写着嘛，一为谋私，二为揽权，三怕干活，一分地他们就不能再游手好闲了。这小子没白在城里多喝了几年墨水子，看问题就是眼光尖，一针见血！”

“这小子表面上蔫不济的，在大事上真不含糊。”

“咱别瞎呛呛了，快签名吧。这不写着嘛，‘这个意见

谁同意，请把名来签’。”

“我同意，我签。”

“我赞成，快替我写上。”……

这消息象长了翅膀，一传十，十传百，等到吃早饭的时候，就传遍了全村，在上面签字的人有一百多人。有用钢笔的，有用铅笔的，有用圆珠笔的，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写了个满满当当。

2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苏洛泉正在公社里蒙头大睡。

昨天下午公社书记于振奇召开各大队支书、大队长会议，研究实行大包干后的一些遗留问题。湓阳店没有分，苏洛泉没有去，大队长苏长山虽然去了，对讨论的问题也插不上嘴，只是蹲在一旁闷闷地听。他四十岁挂零，思想开通，对大包干是拥护的。这几年他当大队长感到十分劳累，支书苏洛泉岁数大了，腿脚不那么灵便，论乡亲辈还得叫他个叔，所以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得靠苏长山折腾。“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批就斗，人们话不敢说，屁不敢放，指东上东，指西奔西，虽说心里不服气，不舒坦，有气家里撒，但在生产队里，在公开场合，对大队布置的工作却没人敢顶敢撞。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了两个“凡是”，人们的头上好象没了金箍咒，干部说话不灵了，一些刺头、棍棍儿又涨开了，工作难推动，和干部们抬杠拌嘴的事屡有发生。苏长山有时也觉得社员们说得有道理，并不是歪

词故意和干部们过不去，特别是这大包干，外地的经验在报上登着，在收音机里讲着，邻村的社员们都那么干着。他觉得这办法好，好就好在全村的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由一人做主变成了众人操心，干部们再不用催收催种、天天派工验工，只管征税、敛提留和计划生育三件事就行了，这该多清闲。他多次找老支书恳求：“洛泉叔，随大流，不挨揍，咱村也分了吧。”这个苏洛泉有个老主意，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你说尽管说，他该咋办还咋办，弄得长山也没辙儿。前几天县里转给公社一封告状信，是告濫阳店党支部的，主要是告苏洛泉老保守、老顽固，不接受新鲜事物，还说他屁股底下不干净，不光多吃多占，在副业摊上还有贪污。这事弄得苏洛泉挺腻歪，挺生气，气愤地说：“今天喊解放思想，明天喊思想解放，再解放就解放得没边没沿了。没个约束，没个管教，还不乱了套！”他心里窝着火，憋着气，公社的会不开，村里的事儿没心思干，事事叫长山顶着。长山今天来公社开会，听了各村的情况，特别是听了于书记传达的县委的一个文件，思想更加开朗了，认识升腾了：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分田单干，而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就是为了克服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是为了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这样做更适合于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更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散了会，他去找公社书记于振奇，欣喜地说：

“于书记，今天的会开得太好了，这个县委文件太重要了，可惜俺们老支书没有来。我求你今天晚上把他叫到公社